



# 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

李小云 马洁文 唐丽霞 徐秀丽

[摘要]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成为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热点。文章以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化为主题,从减贫的视角切入,主要从中国贫困的变化、中国减贫的基础以及中国减贫的动力和要素等方面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简要讨论。文章认为,中国的减贫经验一方面是中国特定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融入全球经济过程的附属物,更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先发展农业以及将农村工业与相应小城市的发展有机地连接起来的经验是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国际化中的重要内容,而如何将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的实质性内涵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分享而非将其机械化地复制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 贫困线; 发展经验; 减贫经验; 国际化

DOI:10.13240/j.cnki.caujss.2016.05.002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9.9%,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6.3%<sup>[1]3-4</sup>。更具体地来看,1979年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到了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16美元,跨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减贫。以中国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为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了2015年的5575万<sup>①</sup>;即使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60.7%下降到了2011年的6.3%<sup>[2]</sup>。这一巨大的减贫成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那些长期处于经济低迷和减贫无力的非洲国家。国际社会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发展成就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按照经典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除非战后和自然灾害之后的重建,否则,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其次,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有过20多年的超过7%的增长,但这些都被认为是特例或奇迹。因此,邓小平在1981年提出到20世纪末这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即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而这一目标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不可实现的,但实际上,中国从1979年到2010年实现了9.9%的经济增长<sup>[1]4</sup>。与此同时,从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中国减贫人数是东亚地区所有国家减贫的81%,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108%<sup>[3]8</sup>,这意味着扣除中国的减贫人数,全球同期的减贫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

因此,在过去十多年中,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成为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领域

[收稿日期] 2016-06-05

[作者简介]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193;  
马洁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唐丽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副教授;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副教授。

① 2015年的农村扶贫标准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参考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同比减少1442万人,2016年2月29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229/14240919\\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229/14240919_0.shtml), 访问日期:2016年7月1日。

中的热点。理论研究从发展研究、比较政治学、新结构经济学等角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动因;而发展实践的重点则着眼于中国经验如何运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关注中国发展经验思潮的推动下更是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经验国际化”这一主题形成了一系列讨论,中国政府也明确将减贫作为中国成长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机制和媒介进行积极的宣传与推广。针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实践和这样一个经验是否具有普世性等问题的研究很多,例如,有观点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中国巨大的扶贫成就不仅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sup>[4]</sup>;还有观点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针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可持续性的问题曾有很多的质疑,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虽开始下降,但随着普惠性社会保障性制度的推进,中国的发展由过去相对倾向于穷人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包容性的发展模式,中国经验开始受到国际领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sup>①</sup>;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模式”论述和倡导,有研究认为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而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sup>[5]</sup>;国际学术界也还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sup>[6]</sup>。但是,如何历史地、客观地以及辩证地看待中国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其普世性的问题则更需要长期、科学和审慎的研究。本着这一原则,本文主要从减贫的角度对中国发展经验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 一、中国贫困的变化:数据的迷思

目前,对于中国贫困的数据统计的现状可以用“混乱”一词来形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造成了对贫困状况的不同估算的结果<sup>[7]</sup>,不同的机构也往往会出于自身的考虑,采用不同标准下“生产”出来的不同数据。20世纪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划定了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生存性营养标准,然后根据20%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测算满足这样标准的相应货币价值,这一货币价值成为“食物贫困线”<sup>[3]30</sup>。根据这个标准测算出来的1985年的农村官方贫困线是每年人均纯收入206元,2000年大幅提升至625元,5年后则微调至680元。但是,贫困线的提升只是名义上的增加,如果考虑到价格的上涨,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这20年间以1985年不变价格测量出来的真实贫困线实际一直处于200元上下<sup>[3]30</sup>。表1是按照这个贫困线估算出来的官方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的数据。按照这个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了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官方还进一步划分了低收入贫困线,根据低收入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的6213万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贫困发生率从6.7%下降到2.8%。这也是中国官方经常用于宣传中国发展成绩时使用的贫困数据。

全球贫困人口的估算和比较最普遍采用的是世界银行的估算体系。按照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1~1.25美元和中等收入国家2~2.5美元的估算,2008年之前,中国的官方贫困线只相当于国际标准的60%,官方低收入线相当于国际贫困标准,但是实际上这条线仍然略低于国际贫困标准,只

① 李小云. 分享中国经验莫陷入误区. 环球时报, 2014-09-25.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4-09/5149308.html](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4-09/5149308.html), 访问时间:2016年6月30日。

表1 中国的贫困变化(1978—2010年)

年份	低贫困线	贫困人口数量/百万	贫困发生率/%	低收入贫困线	贫困人口数量/万	贫困发生率/%
1978年以前	100	250	30.7	—	—	—
1985	200	125	15	—	—	—
1990	300	85	9.5	—	—	—
1991	304	94	10.4	—	—	—
1992	317	80	8.8	—	—	—
1993	350	75	8.2	—	—	—
1994	440	70	7.6	—	—	—
1995	530	65	7.1	—	—	—
1996	580	58	6.3	—	—	—
1997	640	50	5.4	—	—	—
1998	635	42	4.6	—	—	—
1999	625	34	3.7	—	—	—
2000	625	32.09	3.40	865	6 213	6.7
2001	630	29.70	3.2	872	6 102	6.6
2002	627	28.20	3	869	5 825	6.2
2003	637	29.00	3.1	882	5 617	6.0
2004	664	26.10	2.8	924	4 977	5.3
2005	683	23.65	2.6	944	4 067	4.3
2006	693	21.48	2.3	958	3 350	3.7
2007	785	14.79	1.60	1 067	2 841	3
2008	—	—	—	1 067	4 007	4.2
2009	—	—	—	1 196	3 597	3.8
2010	—	—	—	1 196	2 688	2.8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贫困监测报告整理。

达到了国际贫困标准的80%<sup>[8]</sup>。更进一步来看,根据中国官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发生率事实上远远低于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测算出的贫困表达估计。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在1981年分别是73.5%(1美元)、84%(1.25美元)、97.8%(2美元)和99.4%(2.5美元);而到了2005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相应地分别下降到了8.1%(1美元)、15.9%(1.25美元)、36.3%(2美元)和49.5%(2.5美元)。因此,如果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来看,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虽然也在下降,但是不同时期的贫困发生率则高于中国的官方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率的水平(见图1)。

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大幅调整官方贫困线。以2011年为起始点,中国官方的贫困线上升到每人每年2300元,按照价格变化的调整,2014年贫困线调整为2800元,调整贫困线的依据是农村每人每天的收入可以支持一斤米面、一斤蔬菜、一两肉蛋,即保障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热量和60克左右的蛋白质;同时还要支持基本的衣着、水电、交通通讯、教育和医疗的支出等非食物消费支出<sup>[9]</sup>。按照这个标准,如表2所示,中国的贫困人口1978年为7.70亿,2005年为2.87亿,2010年仍有1.66亿贫困人口,所以,提高贫困线标准对贫困人口数量影响明显。中国官方提高贫困线是基于多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首先,长期过低的贫困线排除了很多处于贫困线之上的贫困人口,使得这些人口无法受益于扶贫政策,造成了实际的贫困状况与官方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反差。如果将中国的官方贫困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水平调整的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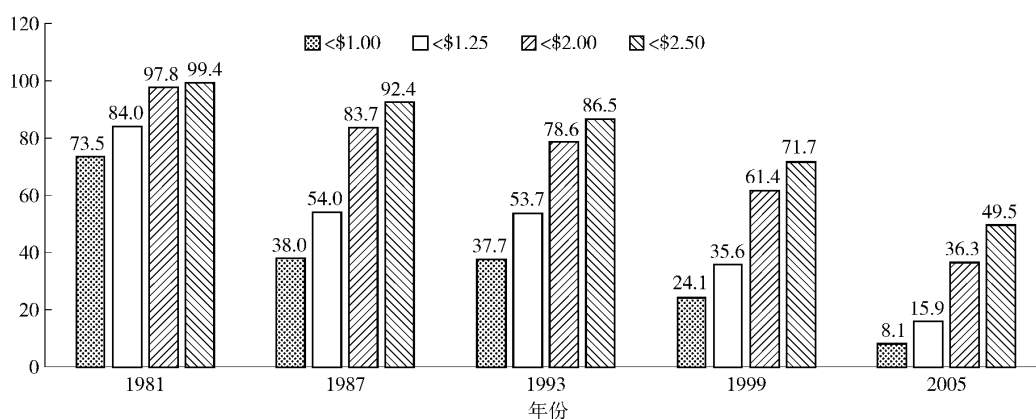


图 1 1981—2005 年间中国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1 美元、1.25 美元、2 美元和 2.50 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贫困数据库整理。

方贫困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以 2000 年为例，低收入贫困线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还保持在 38.39% 的水平，但到了 2010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 20.21%。另外，虽然中国没有正式公布过城市贫困标准，但各地为了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以被视为城市贫困标准。以 2009 年为例，中国城市低保标准为 2 733 元/年<sup>①</sup>，而同期中国农村贫困线仅为 1 196 元，农村贫困标准仅为城市低保标准的 43.75%；另一方面，2009 年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1 210 元/年，也同样要高于当年的国家贫困线。此外，中国的官方贫困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进行横向比较，都是偏低的，在亚洲地区，中国的国家贫困线要低于印度、尼泊尔、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柬埔寨、巴基斯坦、不丹、斯里兰卡、菲律宾、蒙古、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sup>[10]</sup>；其次，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有能力扶持更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如不对贫困线进行调整则无法进行扶贫资源的持续投入；最后，中国经济的成长越来越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大国际贡献的压力，如果按照低于国际贫困线的水平估算贫困人口，那么中国几乎没有贫困人口，这不符合中国贫困的真实状况，也不利于中国客观地履行国际义务。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于 2015 年提高了全球的贫困线。世界银行依据生活成本上升的实际分别将低收入贫困线和中等收入贫困线提高到 1.90 美元和 3.10 美元。按照这个新的标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在 1981 年分别是 88.32% 和 99.14%，2005 年则为 18.75% 和 41.76%，新标准下中国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按照 1 美元和 2 美元估算的数据（图 2）。据测算，中国的新的贫困线按照现价相当于 1.6 美元<sup>[2]</sup>，这个数据高于世界银行 1 美元，但是仍然低于新的 1.90 美元的标准。世界银行调整贫困线一方面也反映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继续投入减贫提供数据的支持的考虑。因此，不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内的事实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

表 2 新贫困线下的中国贫困的变化 (1978—2014 年)

年份	贫困人口/百万	贫困发生率/%
1978	770.39	97.5
1980	765.42	96.2
1985	661.01	78.3
1990	658.49	73.5
1995	554.63	60.5
2000	462.24	49.8
2005	286.62	30.2
2010	165.67	17.2
2014	70.14	7.2

资料来源：参见文献 [9]。

① 根据民政部《200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 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 227.7 元/月。

出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 , 贫困的客观性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反复生产和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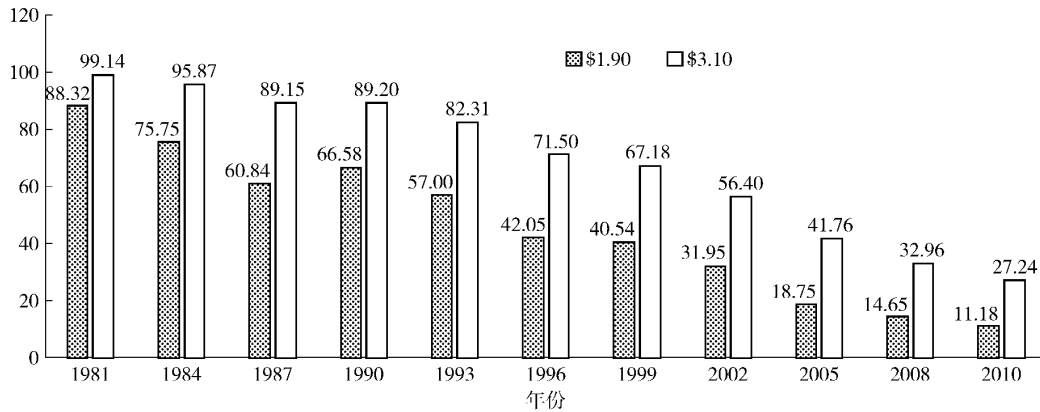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银行新贫困线下(1.9 美元 3.1 美元 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综上所述 , 尽管不同的贫困线下得出了不同数量的贫困人口 , 但是无论从那个角度看 , 中国的减贫成绩都是显著的 , 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减贫给予很大关注的客观原因。因此 , 研究并解释中国的减贫的机制也就成了国际发展研究领域过去 20 多年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 , 以各种形式与中国进行减贫交流活动也逐步成为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学习的中心内容。

## 二、中国减贫的基础: 不能忽略的历史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学者在谈到中国的减贫经验时 , 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中国的减贫历史从中国发展的历史中切断为 1978 年以后 , 尤其是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对比时普遍采用中国 1979 年 GDP 只有 210 美元这个客观事实 , 从而推论市场化的改革如何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这本身也没有错 , 但是 , 这样的结论并不全面 , 它强调的是作为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动因在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减贫中的显著作用 , 这尤其对于那些在同一时期采用了面向市场的改革 , 却没有取得同样业绩的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但是却忽视增长和减贫的历史条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社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减贫和经济增长的认识。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1978 年之前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从 1949 年开始 , 粮食生产总体上处于增长状态。如表 3 所示 , 中国的粮食总产从 1952 年的 1.64 亿吨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3.05 亿吨 , 粮食总产在 26 年间增加了将近一倍; 而 1978 年之后的 36 年粮食总产才增加了一倍 , 达到了 6.07 亿吨 , 粮食的单产也基本遵循了同样的变化趋势。同样地 , 灌溉面积从 1952 年的 1995.9 万公顷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4488.8 公顷 , 而经过 36 年后 , 灌溉面积才达到了 2014 年的 6453.9 万公顷。此外 , 农业机械总动力从 1952 年的 18.375 万千瓦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1.1795 亿千瓦 , 增加了将近 60 倍 , 到 2014 年增加到了 10.8057 亿千瓦 , 后 36 年间增加了不到 9 倍; 化肥施用量从 1952 年的 7.8 万吨 , 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884 万吨 , 增加了 100 倍 , 而 1978 年到 2014 年的 36 年只增加了不到 7 倍。当然 , 这样的比较本身意义并不大 , 因为在低水平下增加投入一般都会取得高的投入增长率 , 而当高投入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 由于基数增大会自然导致增长率的下降。但是 ,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农业发展在 1978 年之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 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 , 我们回顾一下同时期我国工业的发展。1978 年之前 ,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 , 工业化也在快速发展。1949 年 , 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30% , 这一比重在 1978 年达到了 74.4%。如果不考虑工业的结构问题 , 那么可以说中国在 1978 年之前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见图 3)。与欧美、

前苏联、日本和印度相比,1950 年到 1980 年,中国工业的增长率是最高的(见图 4)。也就是说,1978 年之前,中国已经创造了工业化的奇迹。当然,中国在 1978 年之前的工业化实行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道路,造成了工业结构的失衡。

表 3 中国不同时期粮食和农业发展条件的变动(1952—2014 年)

	粮食总产量 (万吨)	粮食单产 (千克/公顷)	灌溉面积 (万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化肥施用量 (万吨)
1952	16 392	1 320	1 995.9	18.375	7.8
1957	19 505	1 463	2 733.9	121.275	37.3
1962	16 000	1 313	3 054.5	804.825	63.0
1965	19 453	1 628	3 305.5	1 098	194.2
1978	30 477	2 528	4 496.5	11 795	884.0
1979	33 212	2 783	4 500.3	13 370	1 086.3
1980	32 056	2 738	4 488.8	14 746	1 269.4
2014	60 7026	5 892	6 4539.5	108 057	5 995.9

资料来源: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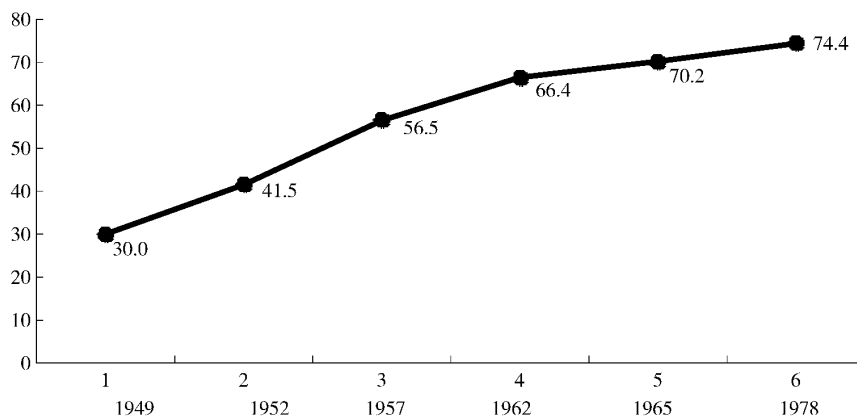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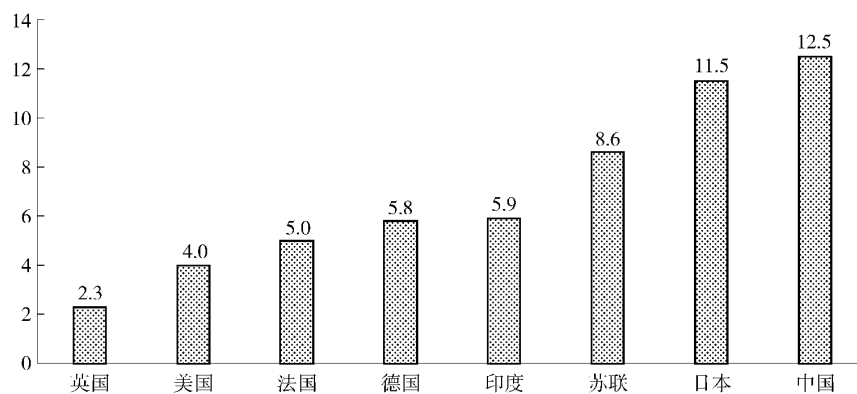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国家工业增长率的比较 (%) (1951—1980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不仅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在1978年以后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减贫,还与中国在1978年之前在教育 and 卫生方面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中国的初级教育按照每万人中的比例计算,1949年为450人,到了1978年增加到了1519.2人<sup>[11]</sup>;从生存性的指标衡量,1975—1977年中国平均营养水平虽然大大低于发展国家的水平,但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见表4)。

表4 1975—1977年中国与世界人均水平营养对比

	热量(卡路里/人/天)	蛋白质(克/人/天)	脂肪(克/人/天)
世界平均	2590	69.3	62.2
发达国家平均	3373	98.5	124.5
发展中国家平均	2282	57.8	38.5
中国	2439	63.4	38.9
印度	1949	48.4	29.3

资料来源:范慕韩,编.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当然,以上的简要回顾并不意味着1978年之前中国的发展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中国式的经济发展和减贫效果的关键在于如何思辨地向中国取经。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农业虽然也取得发展,但是在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下,农产品逐渐出现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等问题。其次,工业化过程中也呈现出结构扭曲、重化工业比例过大等问题;此外,由于资本不断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这些工业不能吸收农业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服务业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造成农业劳动化通过不断从农业榨取资本的方式来“弥补”工农剪刀差,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停滞和农力滞留土地和农业的过密化的现象,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国家的工业民的贫困化。因此,中国在1978年之前虽然一直处于发展状态,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除了1978年前30年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外,中国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也是其后在经济和减贫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核心条件。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仅为0.212,即使到了1983年,基尼系数也只增加到0.246<sup>[12]</sup><sup>362</sup>。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的普遍受益,而当起始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时,即使出现经济的增长,但也会出现一则增长无法持续,二则穷人也无法受益于增长的问题,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现实。从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78年的人口增长率为1.6%,并在其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20世纪末以后下降到0.6%,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达不到9%,中国仍然可能获得较高的有效增长率。相较之下,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长期处于2%以上,有的国家人口增长率更高。在高的不平等和高的口增长率率条件下,要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则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非洲国家想要实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减贫业绩,那么非洲国家需要实现高于9%的经济增长<sup>[13]</sup>,而就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目前情况而言,要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 三、中国减贫的动力:农业—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述观点的阐述并不意味着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借鉴中国的发展与减贫经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历程包含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共性的要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中国强调的立足国情的发展观,这也是中国所能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经验。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实现大规模的减贫,除了历史的发展基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1978年之后所实施的立足国情的发展战略。

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同期贫困发生率从63%下降到不

足10%<sup>[4]</sup> 2000年到200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弹性高达-1.09,也就是说人均GDP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下降1.09%<sup>[14]</sup>。图5显示了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变化趋势。对于中国各省份的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高于4000元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省份,贫困发生率都高于6%,有的甚至高达10%<sup>[3]11</sup>。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显示,如果将贫困的变化分解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收入分配的因素,那么经济增长对于短期的贫困变化的贡献率为70%,对于长期的贫困变化的贡献率为95%<sup>[15]</sup>,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缺乏高的增长条件下,只重视社会分配而不能实现减贫的原因。因此,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为可持续的减贫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也是中国减贫的总体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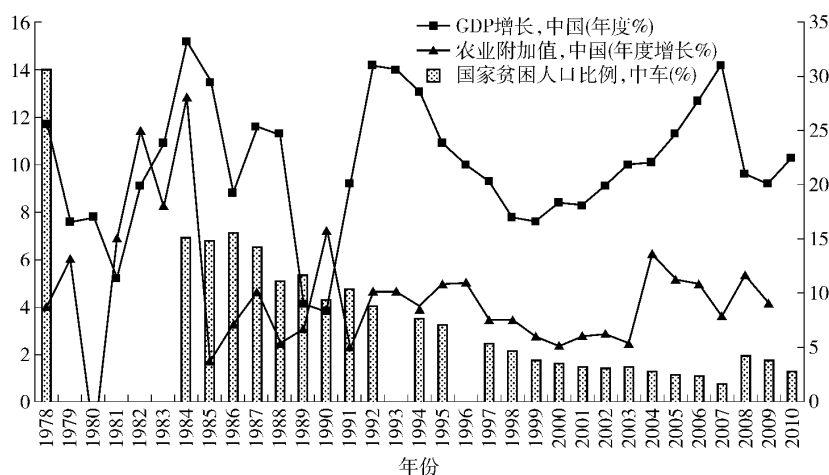


图5 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减贫的关系

资料来源: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2010。

值得注意的是,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接近10%,同期农业产出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sup>[12]3</sup>,中国在这个阶段取得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的成就<sup>[16]</sup>。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贫困线,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了1985年的1.25亿人,即使按照中国新的贫困线,贫困人口减少的绝对数字也是1亿多,与低贫困线下贫困人口减少的绝对数量基本一致。按照1981年到2004年的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在1980年代最初3年中减少了40%的贫困人口<sup>[17]</sup>。这些不同的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了中国的减贫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70—80年代中期,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在1978年为85%<sup>[12]359</sup>,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1978—1985年,农民实际纯收入增长了1.6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5.2%,这个阶段无论是农业的增长还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同时,这个阶段农业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5%<sup>[18]</sup>,这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由此可见,1978—198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业的增长,同时,大规模的减贫也是来自于农业增长的驱动。事实证明,中国在1.6%的人口增长率下,实现了7.7%的农业高速增长,净增长率达到了6.1%,产生了农业的剩余,为之后的工业化提供了条件,以1983年为例,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391.3亿元,比上年增加了约40%<sup>[12]238</sup>。而对于很多非洲国家而言,农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都在3~4%之间,而人口增长都超过2%,农业的净增长率空间被压缩得很低。中国的经验表明,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和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要想实现减贫需要首先推动农业的高速增长,否则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可持续性的减贫。

除了个别发达的资源型国家以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完全依靠农业实现减贫和转型,工业化几乎是通向繁荣的必经之路。虽然对于采用何种方式,以及如何能实现社会和环境友好的包容性发



展都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工业化和减贫两者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是明确的。当然批判发展主义者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本文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中国的实际来看,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0年开始逐年下降,到1997年已经下降到了60%以下,2000年更是跌至50%以下<sup>[12]359</sup>。另一方面,政府从1984年开始正式启动发展乡镇企业,开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1984—1988年乡镇企业总数从606.5万增加到了1888.2万个<sup>[12]239</sup>,后经过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调整之后,乡镇企业的数量在1996年达到了2336万个<sup>[12]250</sup>;1978年到2006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由2827万增加到了14680万<sup>[12]256</sup>;农村就业结构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85年81.9%下降到2005年的59.5%<sup>[12]257</sup>;同期,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比重从8.2%增加到了46.4%<sup>[12]257</sup>,非农产业逐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同时成为了减贫新的动力。农村工业化驱动了中国贫困人口持续下降,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了1995年的6500万。有关研究指出,中国劳动密集的乡镇企业能很快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能在这个阶段提供大量的受过初级教育的劳动力资源<sup>[13]</sup>,这部分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1978年之前初级教育的普及。

然而与农业发展的减贫效益相比,工业化的减贫影响往往非常复杂。一般来说,农业增长的减贫影响是其他产业的四倍<sup>[13]</sup>,这主要是因为农业是每个农民的职业,农民之间只要在土地分配上基本均等,那么农业的增长就意味着普遍的受益。但是,工业和其他产业不同。即便在农业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开始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并且这个模式也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亲贫特点,但是,相比1978年到1985年期间年均减贫人口1786万的业绩,1986年到1990年年均减贫下降到800万,1991—1995年间的平均年减贫人口只有392万,这一减贫速率的下降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放缓直接相关。1986—1995年,农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仅为3.6%,远远低于1978—1985年15%的增长率;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日益凸显,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样本估算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上升为2000年的0.35,2005年再次增加到0.38<sup>[315]</sup>。减贫速率的下降和农村内部不平等的上升意味着工业化过程增加了减贫复杂性。中国今天社会不平等程度偏高来源于工业化的过程,主要也受制于中国没有从不平等开始上升阶段就采用更加包容的发展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量外资急剧进入中国,乡镇企业开始转型。围绕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的数量急剧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统计显示,1985年全国共有建制镇7956个,到了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9811个,首次超过乡个数<sup>[12]495</sup>,大城市的“扩张运动”也在同时向前推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引发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农村流动人口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了将近2.5亿人。1997—2000年,农民纯收入出现下降,但是来自劳务的收入则有所增加;2001—2005,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4.3%,对这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1.6%,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解决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sup>[12]491-492</sup>。由此看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继续驱动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人口继续从1995年的6500万减少到了2005年的2365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它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异。不平等的扩张期也正好是农村人口流动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城市化迅速扩张的时期。这进一步证实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减贫缺陷,同时也催生了中国新的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和开发并举的反贫困战略的形成。

虽然按照官方贫困线估算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是这只是一个很低的贫困线,实际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很大,更为严重的是减贫的速率越来越低,很显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的策略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性已大打折扣。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在1985年之后开始实施“专项扶贫计划”,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探索瞄准性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核心是实践

“协助经济发展”式的扶贫模式,希望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瞄准施予特殊的政策来最终帮助其摆脱贫困。学术界就这一计划对减贫产生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认为专项扶贫项目对于贫困并没有起到减缓作用<sup>[19]</sup>;还有研究指出,扶贫项目对贫困群体的覆盖率仅为16%,低于对中等户51%和富裕户33%的覆盖率<sup>[20]</sup><sup>159</sup>;另有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减贫投入的回报可以达到12%~15.5%的结论<sup>[21]</sup>。客观来看,这一计划的实际意义在于政府认识到了减贫不能完全依靠经济发展,在财力无法承担实施大规模的现金转移式扶贫的情况下,通过瞄准性的开发依然是减贫的有效辅助手段;其次,开发式扶贫也为其后实施的社会保障计划创造了条件,例如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2005年开始加大对农业的补贴,2006年开始实施免征农业税,2007年开始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计划,以及在同一年开始大范围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针对贫困人口的全面的扶持战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2001年起农民收入构成中各种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收入中来自各种转移性收入的比重的加大更为显著,社会保障计划向农村地区的延展也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村减贫的重要动力。

#### 四、结论:中国减贫经验国家化要素的讨论

综上所述,中国的减贫经验一方面是中国特定历史、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融入全球经济过程的附属物。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减贫经验就如同西方工业化的经验一样属于人类共同的经验财富,已经成为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发展类学术著作和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一经验,并希望对这一经验作出理论解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sup>①</sup>。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殊性,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发展的起始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人口规模庞大和国土幅员辽阔,这与很多小国组成的大陆是不同的,并使得中国区域一体化的成本很低,能有效地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减贫经验很难国际化。这些观点都是有价值的论述,然而,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核心问题究竟是要将中国发展和减贫的具体做法在国际上复制,还是将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的内涵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的分享,笔者站在后一个立场上。

首先,中国的发展和减贫是中国文明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升华,是中国社会文化在历史上成功地吸纳非中国文化,并有机地与全球化融合过程的产物。这也是东亚的文化形态继日韩以及其他依循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台湾等相继取得成功转型的又一个成功案例。无论是先期实现转型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历史、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通过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减贫。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20—21世纪的发展实践主导了国际发展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经验。这些经验具有其国际化的需求和基于实证的正当性,并且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是改变和修正了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框架。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有理由需要通过理论的提升从而成为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经验的核心要素就是“因地制宜”。

第二,除了原发性工业国家在其本土基于个人创新和市场发育所形成的“小政府一大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这个模式在北美和大洋洲的衍生以外,东亚和中国的经验都凸显出了政府作为经济

① 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由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提出,旨在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相关文章可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1);以及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发展和减贫的主导力量的重要性。这对于很多不具备西方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领域出现的“政府归来”的现象正是受到了东亚和中国发展经验的影响,中国发展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国际化,因此,政府长期“在场”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也正是这一经验的独到之处。

第三,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和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国家而言,优先发展农业是增长和减贫的基础。国际上虽然有以开发资源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国家和个别的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但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具备人口较少、资源丰富等特点,同时在历史上又普遍与欧洲存在直接的经济联系,实际上也是发达经济体价值链的延伸部分,并不具有发展经验的普遍意义。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中国增长和减贫的技术路径,而且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减贫阶段也不是中国最市场化的阶段,这意味着国家在农业发展和减贫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这虽然无法适用于很多小的国家,因为小的国家无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市场容量方面都无法保证所有产业链的完整,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贫困国家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整合规划将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与小农的生计连为一体。优先发展农业以及将农村工业与相应小城市的发展有机地连接起来,都是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国际化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中国的增长和减贫伴随了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实际上,从相对公平的状态开始增长和减贫时,不平等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过早地抑制不平等会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机会,从而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试想如果民粹主义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也像现在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话,估计中国很难实现高速的增长和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没有在增长的早期就实施大规模的社会保障的确影响了今天社会的公平,但同时也为持续的增长和减贫积累了物质基础。主流意见认为今天开始大规模的社会投入和环境投入,代价太大,但如果过早地进行大规模投入,估计中国又难以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经验中形成了一个“次序性”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经验,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

####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 王萍萍, 徐鑫, 郝彦红.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 调研世界, 2015(8): 3-8
- [3]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 [4] 汪三贵.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 管理世界, 2008(11): 78-88
- [5] 郑永年. 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09(5): 20-28
- [6] Large D.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2008(426): 5-61
- [7] Li Xiaoyun. *PRC's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s and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Effec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thcoming. 2016
- [8] 张全红.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 1981—2005——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 统计研究, 2010(2): 28-35
- [9] 张为民. 脱贫步伐加快 扶贫成效显著 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中国信息报, 2015-10-16
- [10] Bauer A, Thant M. *Pover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Impacts and Response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 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 [12] 宋洪远. 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 [13] Ravallion M. Are There Lessons for Africa from China's Success Against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2009(2): 303-313
- [14] 李小云, 于乐荣, 齐顾波. 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 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10(4): 4-11
- [15] Aart Kraay. *When Is Growth Pro-Poor? Cross-Country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March 2004

- [16] Li Xiaoyun. *What can Africa learn from China's agricultural miracle?* //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3: Ending Poverty, 2013
- [17] Chen S, Ravallion M. Absolute Povert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104): 16757 - 16762
- [18] Li Xiaoyu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fter the Year 2000. *China Rural Economy*, 2010(4): 23 - 35
- [19] Huang J.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Change: 30 Year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8
- [20] 李小云 等著. 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与偏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1] Ravallion M, Jalan J. China's lagging Poor Ar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2): 301 - 305

## Discuss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Li Xiaoyun Ma Jiewen Tang Lixia Xu Xiuli

**Abstrac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or so, China has realized a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in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ness as well as reached a stunning succ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Therefore, how to research and learn from the abundant China's experience in achieving economy growth along with the poverty reduction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ccordingly, the discussions in this paper are among the history and changes of China's poverty, the fundamental basis as well as the primary motivations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involved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successful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to date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one product derived from China's certain history, politics and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is experience is also an attachment of China's positive integrating process in the stage of global economy gradually,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as on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glob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system recently. Furthermor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placing developing agriculture to high priority as well as organically conn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the related cities involved are the key contents comprised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Above all,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way of effectively sharing rather than simply replicating the substances of China's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in disseminating the experience itself worldwide.

**Key words** Poverty lin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ization